

国旗 国歌 国庆

国旗・国歌・国庆——
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
中国近代史

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
与国家象征

一入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四

〔日〕小野寺史郎 著

ONODERA SHIRO

周俊宇 译

国旗・国歌・国庆

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
与国家象征

国旗・国歌・国庆——
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
中国近代史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四

〔日〕小野寺史郎 著
ONODERA SHIRO

周俊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
(日)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5466-5

I. ①国… II. ①小… ②周…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1403号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

国旗·国歌·国庆

——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

著 者/[日]小野寺史郎

译 者/周俊宇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电子信箱/jxd@ssap.cn

项目统筹/徐碧姍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责任编辑/徐碧姍

责任校对/张彦彬

责任印制/岳 阳

印 装/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5466-5

著作权合同/图字01-2014-0696号


登 记 号

定 价/59.00元

印 张/21.75

字 数/312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I

CONTENTS

凡 例	1
序 章 国族主义研究与象征的历史学	3
第一节 研究目的	4
第二节 研究回顾	9
第三节 全书结构	17
第一部 清末、北京政府时期的象征与仪式	
第一章 中国的首面国旗	25
第一节 导论	25
第二节 黄龙旗的制定	25
第三节 外交与官府中的使用	29
第四节 使用和认识的偏差	32
第五节 结论	45
第二章 国旗的论争	46
第一节 导论	46
第二节 兴中会与青天白日旗	47

第三节	同盟会国旗论战	49
第四节	辛亥革命与国旗问题	55
第五节	结论	71
第三章	纪念革命	75
第一节	导论	75
第二节	纪念什么？何时纪念？	79
第三节	由谁纪念？如何纪念？	91
第四节	结论	100
第四章	从国乐到国歌	104
第一节	导论	104
第二节	清季的“国乐”	105
第三节	民初制定“国歌”的尝试	115
第四节	五四时期国歌论战与《卿云歌》的完成	121
第五节	1920年代对《卿云歌》的评价	129
第六节	结论	132
第五章	共和国体与五色旗	134
第一节	导论	134
第二节	政治与国旗	134
第三节	国庆与国旗	144
第四节	结论	150
第二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象征与仪式	
第六章	国民革命与青天白日旗	155
第一节	导论	155

第二节	孙中山与五色旗	155
第三节	1925 年的两面国旗	162
第四节	北伐与易帜	168
第五节	东北易帜	174
第六节	结论	177
第七章	党旗与国旗	178
第一节	导论	178
第二节	国旗的法令规定	179
第三节	国旗意识形态的规定	186
第四节	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	196
第五节	结论	202
第八章	党歌与国歌	205
第一节	导论	205
第二节	国歌、党歌及国民革命歌	205
第三节	国民党党歌的确立过程	212
第四节	围绕国民党党歌的讨论	218
第五节	制定国歌	220
第六节	结论	232
第九章	历书上的“革命”	235
第一节	导论	235
第二节	北伐以前的纪念日	235
第三节	党国的纪念日体系：1927 ~ 1928 年度	240
第四节	纪念日体系的确立	246
第五节	结论	269

终章	从国家象征所见的中国近代史	277
第一节	通史性的概观	277
第二节	战时与战后	283
第三节	结论	292

征引文献	297
------	-----

索引	321
----	-----



图0-1 丰子恺：《民族教育的 FIRST STEP》

资料来源：《教育杂志》第24卷第1期，1934年9月。

序章 国族主义研究与象征的历史学

图 0-1 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讽刺画家、插画作家、漫画家丰子恺 (1898~1975) 所绘作品。这张画刊登在近代中国具代表性的教育刊物《教育杂志》(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9 月号上。丰子恺有留学日本的经验, 也以散文家、美术及音乐教育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而且, 还译有屠格涅夫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的《初恋》等书, 是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

九一八事变后, 第十九路军也于 1932 年 1 月 28 日在上海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爆发冲突, 是为一·二八事变。由于日本派出相当于三个师的增援军队, 国民政府也投入第五军, 双方持续进行了激烈的城市战, 直到同年 3 月停战。结果, 上海市民和市街遭到莫大波及与损害, 在当时属中国最大出版社的商务印书馆及其附设东方图书馆共计 35 万册藏书归于灰烬^①。同时, 《教育杂志》亦被迫长期停刊。1934 年 9 月号乃其复刊后第 1 号, 而刊载于卷头的, 便是这张画。

位于图画中心的旗杆上, 挂有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一位看似女性的教师在旗下弹着风琴。周围牵手的孩童们仰望国旗所唱的, 想必是中华民国国歌。空中可见在当时属尖端科学技术的飞机, 成

^① 高綱博文「上海事变と日本人居留民—日本人居留民による中国人民衆虐殺の背景— [一·二八事变与日本居留民: 日本居留民屠杀中国民众的背景]」、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日中戦争—日本・中国・アメリカ [抗日战争: 日本、中国、美国]』、東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93。

编队朝向国旗飞行。相对于画中的女性与孩童，这面旗帜和飞机或许也可以解读作军队也即男性的象征。遭逢前所未有的国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所引为目标的“民族教育的 FIRST STEP”究竟是什么呢？这张图画的表现手法虽有丰子恺特有的简略，却又毫无保留地将上述目标体现出来。

第一节 研究目的

“仪式”与“象征”等乍见之下如咒术般的要素，其实毫无疑问地在近代国家更具重大意义。这一点，历史学至迟在1970年便明确认识到。作为先驱性著作，今日仍可举为代表性成果者，是乔治·L·莫塞（George L. Mosse）在1975年的著作。莫塞在该书中，将起源于19世纪德国统一过程中、借由作为世俗宗教的国民神话或象征以及参加仪式或庆祝来体现国民统一性的反议会主义式政治形式，命名为“新的政治”。据莫塞所言，德国的这个“新的政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众政治时代展开，于1933年国民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胜利达到顶峰^①。莫塞的分析手法及其结论，给日后的法西斯主义研究，以及国族主义研究带来莫大影响。

为迄今的国族主义研究立下基础的1980年代经典著作中，最以明确关心来面对这个提问的，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论文集。该书强调，在18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间选举制民主主义广泛推进和大众政治出现的进程中，作为征集服从或忠诚心的新方法，不仅在德国，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公共仪式及纪念日、建筑物、广场、纪念碑等“传统”被大规模地创造出来^②。

① George L. Moss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H. Fertig, 1975).

②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尔后，一方面由于“国族主义乃近代产物”这个观点在历史学中被普遍接受；另一方面也由于日常生活与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意识被引入法国年鉴学派之后的社会史研究中，各国近代史研究迎来国族主义及仪式或象征研究的繁荣。

在法国史领域，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84~1992年耗时8年，动员120名历史学家，编纂了巨著《记忆的亮点》^①。该书对于国族主义的问题意识虽与莫塞或霍布斯鲍姆不同，但在“追寻法国国民意识样貌”的主题下，针对“单一不可分的共和国”的象征——三色旗、《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巴士底（Bastille）纪念日，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标语，圣女贞德（Jeanne d'Arc）、埃菲尔铁塔（La Tour Eiffel）等加以探讨时，在方法论上与上述既有研究的共通点很多。

在美国史领域，有关国族主义与仪式、象征的关联，1990年代已有许多研究发表。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为史考特·M. 钩特（Scot M. Guenter）的研究，即以针对国旗制度做最早决议之大陆会议举行的1777年至第二届国旗会议对有关国旗处理方式的官方规定做最终确定的1924年这段时期为对象，探讨美国国旗的设计及使用方式的变化。该书特征是，援用“公民宗教”的概念，重视经南北战争时期、1880年代到1890年代国旗崇拜确立的过程中各式各样的团体均发挥了作用这一点。此外，该书指出对如何处理国旗最早做规定的是美国，之后许多国家才加以效法，这一发现也很重要^②。社会史家约翰·包德纳（John Bodnar）则从对美国例行纪念活动的分析中，

①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84-1992). 此外，谈论法国革命时祭典问题的代表性研究有 Mona Ozouf,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9*, (Paris: Gallimard, 1976);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立川孝一「フランス革命と祭り」〔法国大革命与庆典〕（東京，筑摩書房，1988）；等等。

② Scot M. Guenter, *The American Flag, 1777-1924: Cultural Shifts from Creation to Codification* (Rutherford, N. 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指出攸关历史故事及象征的“公共记忆”是19世纪个别民众之利益与公共利益竞合下形成的产物，其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契机，使得其主流性格转为由国家权力统制唤醒爱国主义^①。此外，地理学者肯纳斯·E.福特（Kenneth E. Foote）一方面提及霍布斯鲍姆及包德纳的讨论，一方面通过对纪念碑的分析，弄清了美国史上的暴力与悲剧被以圣别、选别、复旧、抹消四个模式刻画到“景观”里的过程^②。

在日本近代史领域，1990年左右也迎来对此一主题研究的繁荣。在此，明治时代以来作为国民统合象征的天皇形象成为讨论中心。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可以举出多木浩二的研究。多木浩二运用图像分析法，对在浮世绘中被不可视化、神秘化的天皇姿态因明治5年（1872）开始引进西服及军人化而作为“可视性权力”被再建构，乃至在各地“巡幸”（天皇的巡游）、明治20年代“御真影”（天皇及皇后的相片）向小学颁付之过程进行探讨^③。此外，T.藤谷（T. Fujitani）依据多木的研究及福柯的权力论，主张在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1870年代至1914年世界性的“国家间仪式竞争”时代中，经过明治初期的巡幸时代，日本也创造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仪式体系^④。另一方面，原武史批判藤谷等学者的论述，指出天皇、皇太子的“巡幸”“巡启”（皇太子的巡游）在明治后期以降，即便应时所需改变形式，仍通过“视觉的支配”而持续成为“臣民”统合之重要契机。原武史对大正末期以来成为举行亲阅式、观兵式以及其他仪式之“神圣空间”的皇居前广场的

① John Bodnar, *Remaking America: Public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Patriot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Kenneth E. Foote, *Shadowed Ground: America's Landscapes of Violence and Traged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除上述之外，尚可参阅比较探讨1970年代以降欧美纪念节庆的William M. Johnston, *Celebrations: the Cult of Anniversa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③ 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天皇之肖像〕』、東京、岩波書店、2002（初版1988年）。

④ T・フジタニ著、米山リサ訳『天皇のページェント—近代日本の歴史民族誌から〔天皇の游行：从近代日本历史民族志看〕』、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4。

功能及其战后变迁皆做了详细探讨^①。

当在社会史领域抱持日常生活及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关怀时，可以了解到“仪式”及“象征”便是个人与国家结合的媒介。也就是说，“仪式”以及“象征”这个分析视角的有效性，将使得“在国家向每一位国民要求忠诚的所谓近代的时代里，国家实际上在人们眼前以何种形式出现，又如何作用？而人们如何认识国家，对待国家？”这个设问变得可能。“近代战争仰赖国民的忠诚感。可是，国家本身除了可供想象描绘的象征体系外，实不具可触知的实在性”^②。特别是“在君主不存在的共和制国家中，和可以借由向君主这个眼目可及的‘人格’宣誓忠诚、诱发出对君主所体现之国家的忠诚心的君主制国家相异，必须使其对国家这个抽象的存在本身，直接抱持忠诚心才行”^③。在此，就产生出象征国家之“国家象征”的存在的必要性。人们只能通过“象征”想象、描绘国家，而且也只能借由某些共有的仪式，来对国家表现忠诚。

在近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族主义也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④。近代中国国族主义研究中，援引“仪式”或“象征”的分析视角，应当别具效果。那是因为虽然霍布斯鲍姆是从对欧美各国的分析出发，指出“所谓的国族，与其说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不如说大多是国家设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⑤，但在由于与欧美接触而被迫急速进行近

-
- ① 原武史『可視化された帝国——近代日本の行幸啓〔被可视化的帝国：近代日本の行幸啓〕』増補版、東京、みすず書房、2011（初版2001年）；原武史『増補 皇居前広場』、東京、筑摩書房、2007（初版2003年）；等。
- ② David I.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
- ③ 和田光弘「訳者あとがき〔译者后记〕」S・M・グインター著、和田光弘、山澄亨、久田由佳子、小野沢透訳『星条旗1777～1924』、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7（原著1990年）、第310頁。
- ④ 关于现行中国国族主义研究的概要，可参阅黄兴涛《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广东社会科学》第137期，2009年6月）等。
- ⑤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8.

代国家建设的其他地区中，这个倾向应该更为显著，中国亦不例外。至少在本书以为对象的清末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年代来说是19世纪末到1930年代——与其说是国族主义引导革命，不如说是革命发生后，国家、政党或知识分子由上而下试图创造出国族主义。然后，正如本章开头部分所见，近代中国的国家、政党或是知识分子对于创造国族主义的仪式或象征的重要性，极具自觉性。

本书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将探讨近代中国各时期的政府、政党、知识分子等，如何将仪式或象征利用于唤醒国族主义，具体而言，又以何种政策或运动来实施，而人们又如何认识、对待等课题。

不过，在进行具体探讨之际，有必要进一步对研究对象做一定程度的范围限定。在制作近代国家仪式或象征一览表的作业上，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的政治学经典《政治权力》非常有帮助。关于该书，有1932年6月造访柏林的梅里亚姆目睹当时激烈变动的德国政治仅六周就写就这样一段逸闻。1932年7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世人皆知，在那场选举中，国民社会主义德国劳动党（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那就是其后被莫塞命名作“新的政治”，即通过仪式及象征所达成之“大众的国民化”达至顶点的时代。梅里亚姆在其观察中，得出“无论是哪种权力，仅仅凭靠物理性力量并不能维持自我”这一结论^①。而且，他也指出在权力自我正当化的常见手段中存在诉诸大众知识的“理性面支配”（Credenda）及诉诸大众情绪与情感的“感情面支配”（Miranda）两类。作为“感情面支配”的事例，可以举出使群众在视觉、听觉以及美感上入迷并加以动员的“象征”，也就是“纪念日以及应该留存于记忆中的时代，公共场所以及纪念碑式的道具，音乐及歌曲，旗帜、装饰品、雕像、制服等艺术的设计，故事与历史，精心策划的仪式，以及伴随着行进、演说、音乐等的大众示威

^① Charles Edward Merriam, *Political Power: Its Composition and Incidence* (New York; London: Whittlesey House, 1934), p. 102.

行为”^①。此外，这个国家的国名本身、古今君主或领导者的身体及其家族、将国家疆域可视化的地图、座右铭或口号等种种图像、言论、场所、行为，也有成为国家象征的可能。

近代中国也有大量仪式及象征存在。其中，在近年尤其引人关注的，是1920年代后半期以降中国国民党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总理遗像、总理遗嘱、中山陵、总理奉安大典、总理纪念周等与“国父”孙中山个人崇拜相关的仪式及象征受到极大重视这一现象。因此，如后所述，有关这些以孙中山为中心的仪式及象征已有相当程度的研究积累。虽然本书也将提到近代中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种种仪式及象征，但将以国家本身的象征——国旗、国歌以及作为其使用场合的国家纪念日为主要探讨对象。在国家相关象征中，尤其是国旗、国歌、国玺、国徽、国花等，乃是近代国家必定遵循一定形式以拥有的。那是“在国家间体系的仪式及信息中，以可供比较的同质形式为前提”之物，“其他象征所没有的特权性运用以及划一式的仪式行为便是其特征”^②。因此，有关这些象征，若与同时代或是早先的其他国家来比较，是相对容易的。加之，与国民党、国民政府特有的孙中山崇拜不同，这些象征是清末以来一直被人讨论的题目，所以能做长期性分析。本书认为，以共时性（synchronicity）的比较视点为横轴，历时性（diachronicity）的变化视点为纵轴，可为近代中国国族主义、仪式以及象征问题提供新的见解。

第二节 研究回顾

近代中国有关国旗及国歌制定过程的研究，过去便已存在。仅限

① Merriam, *Political Power*, p. 105. 尚可参阅：阿部齐『概説現代政治の理論〔现代政治理论概论〕』（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第6~7页）。

② 長志珠絵「国旗・国歌」，西川長夫、大空博、姫岡とし子、夏剛編『グローバル化を読み解く88のキーワード〔解读全球化的88个关键字〕』、東京、平凡社、2003、第125頁。

1980年代以后来看，有汪林茂关于清朝首面“国旗”黄龙旗制定过程的研究^①，以及刘云波关于革命派内部——孙中山与黄兴在国旗问题上的论争的研究^②。此外，还有皮后锋概论式讨论近代中国国歌变迁的论文^③。台湾方面也有孙镇东及陈恒明讨论中华民国国号、国旗、国歌、国花的研究^④。只是，上列研究的目的皆在弄清国旗及国歌变迁的史实，缺乏更进一步的问题意识。

对此，1990年代以后，直接受到前述各国近代史研究影响的欧美研究者之中，出现了着眼于近代中国仪式或象征与国族主义关系的研究。汪利平引用莫塞、霍布斯鲍姆、藤谷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际，孙本人通过遗嘱或仿效列宁保存遗体以及埋葬南京等指示，意图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国家象征，而自命为孙中山继任者的国民党领导者间，围绕南京的中山陵营建和1929年奉安大典施行方法，争夺“遗教”诠释权。汪利平通过这样的分析，主张：正因为难以确立排他性诠释的暧昧性存在，各派政治势力才得加以利用，使孙中山成为超越政治的国民统合象征^⑤。对此，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则注意到在被汪利平指为缺乏国家统合中心、“社会、政治真空状态”的北京政府时期国旗五色旗的统合作用。费约翰在其讨论近代中国国民统合的著

-
- ① 汪林茂：《清末第一面中国国旗的产生及其意义》，《故宫文物月刊》第10卷第7期，1992年10月。
 - ② 刘云波：《论孙、黄“国旗式样之争”》，《中州学刊》第96期，1996年11月。在概论方面，尚有忻平《五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忻平、胡正豪、李学昌主编《民国社会大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等。
 - ③ 皮后锋：《中国近代国歌考述》，《近代史研究》第86号，1995年3月。在概论方面，尚有：忻平《中国国歌史略》，《社会科学研究》第47期，1986年11月；忻平：《〈卿云歌〉——〈三民主义歌〉》，忻平、胡正豪、李学昌主编《民国社会大观》；等。
 - ④ 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1；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此外，虽非学术论文形式，周开庆《行知集》（台北，畅流半月刊社，1975）也讨论了中华民国国旗、国歌，以及作为辛亥革命纪念日的国庆日。
 - ⑤ Liping Wang, “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Vol. 21, No. 1 (April 1996).